

“家族制度”对日本亲台右翼政客的影响

——兼论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的结合

□ 邓 婧

摘 要: 随着日本政坛世代交替,一些战后成长起来的中生代政治家逐渐掌控日本的政局。这些政治家很多是日本右翼“亲台”政界人士的后代,并且他们在政治风格上都明显表现出“子对父”政治理念上的继承。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对于日本的政治和外交的影响将可能长期存在,因此有必要探究能支撑这种具有延续性政治理念的因素,其中“家族制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对日本右翼政客的行为起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关键词: 家族制度; 右翼政客 “台湾帮”; “台独”

当今掌控日本政坛权力中枢的右翼势力中不乏一些是上世纪“台湾帮”成员的后代。日本政界的这些亲台势力都“子承父业”,全盘继承了长辈们的思想和行动。日本作家本泽二郎在其《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一书中指出过这一现象,“鸽”派的后代不一定是鸽派,“鹰”派政治家的第二代必定是比其父更强硬的“鹰”派政治家。^①“家族制度”不单纯是以婚姻和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具体家庭,家庭不过是纵式延续,从祖先到子孙这样无穷无尽繁衍下去“家”的存在形式而已。在这个意义上说,即使家族成员在肉体上不存在了,也并不意味着“家”的消失,它在观念上依然存在。^②可以看出“家族制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存在,它所倡导的是即使肉体不在,但是家族信念也依然永存。本文通过对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日本“家族制度”对日本右翼政客及其组成的“台湾帮”的影响进行探究,并在此基础上对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的

结合进行分析。

一、“家族制度”与日本右翼的“家族国家观”

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制度”一直是延续日本国家发展的血脉,“家族制度”不单单是日本传统社会倡导的以父系为主的社会架构,还有它对日本民族的思想意识的控制。“家族制度”与儒家的“忠”与“孝”相结合,即子女要对父母孝顺,在武家政治时期,武士要对领主尽忠。明治时期天皇成为真正的天皇制代表者,“家族制度”与“天皇专制主义”的结合,使得天皇被“神权”化。个人、家、国家融为一体,从而实现“孝悌的家族成员”→“有用的自治公民”→“忠良的国家臣民”的国家道德的自觉升华。^③在近代和二战时期,日本右翼力图把日本作为“本家”而把亚洲各国作为“分家”,推广以日本为主的“国家观”,以“家族国家观”为幌子,以“天皇制”为精神支撑,培养了顺从的日本民

众来推动战争的进程；家族制度对战后日本政坛的世袭现象产生重要影响，也造成了日本右翼政客对侵略历史的否定。

(一) “家族制度”与日本右翼的“皇国史观”

“皇国史观”是日本社会的“家族制度”与“天皇专制主义”的结合，由“家族国家观”衍生而来。“家族制度”最初提倡的是一种以父权为中心的社会，但随着历史的推演，结合了儒家的“忠与孝”的家族制度演变为意识形态而存在于日本社会，战时天皇成为了日本人一生尽忠的对象，顺从的臣民为了尽忠天皇而死应该是要受到国家尊敬的，即所谓的“国家有罪，人无罪”。

“皇国史观”与演变为意识形态的“家族制度”有异曲同工的效用，在日本战时帮助日本右翼使天皇成为日本民众盲从战争的精神支柱。进入昭和时代，皇国史观受到了日本政界和军界的重视，在民众中培养对天皇的绝对忠诚；在战时状态下培养为天皇而誓死如归的臣民。这种把“家族制度”作为掩护进行修饰的“皇国史观”被日本一些右翼保守势力扭曲成为了对外进行侵略扩张的理论基础。所谓“史观”其实并不是提倡正确的历史事实，而是麻痹战时日本民众的精神迷药，作为战时动员日本民众的有效工具才是它的真面目。“皇国史观”最核心的思想是推崇对“万世一系”的天皇统治的服从，使右翼势力主张对外的侵略路线披上了一层“顺应天命”的神秘色彩，以此蒙蔽日本民众。他们所谓的“八纮一宇”四个字是由日莲宗佛传道者田中智学从日本最早的“敕撰历史书”——《日本书记》中记述神武天皇定都于大和（古地名，在今奈良县辖内）时所颁发的诏书使用过“兼六合以开都，绕八纮而为宇”概括而来的^④，本意指世界一家。其后，这一理念被日本右翼势力利用，被赋予建立在日本主导下，以日本为盟主、其它各国为附庸的亚洲共

同体、世界共同体的寓意，使一切在天皇的名义下进行的战争，都是成为了实现“八纮一宇”的理想的“正义”的行为。

(二) “家族制度”与战后日本政界

1、家族主义与集团主义的结合

日本战后即使进行了民主改造，但是传统文化中“家族制度”的影子对日本政界的影响并没有消失，日本还是一个受“家族主义”控制的纵向社会，战后日本政界的派阀政治就是最好的例证。虽然在2001年小泉纯一郎上台后对自民党内进行过派阀政治的改革，但是派阀政治在日本政界并没有因此消失，仍然以更加细小化和流动化的形态存在于日本政界。

日本政界不能彻底根除政党内派系林立、“党中有党”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日本政界内部的纵向结构。日本政党内部的纵向集团关系决定了政党内部的“亲子关系”结构，特别是新保守主义主导的自民党内的世袭议员政治。这样的结构有利于党内集团领导者树立权威，在这样一个集团里，人们通过对同一权威的崇拜，使彼此之间感受同属一个集团，获得一种命运连带感，表现出对集团整体的精神权威的绝对依赖。^⑤但是党内的最高领导权力发生变化后，集团内部又会分化出不同的小集团，这些集团甚至走向对立。同一政党内集团纷繁，同一集团内又派系林立。现执政的自民党有七大主要派系分别是：町村派、古贺派、额贺派、伊吹派、山崎派、麻生派和高村派。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隶属于町村派。町村派是由岸派→福田派→安倍派→三冢派→森派演变而来的，在自民党内一直都是保守主义派系。二是党内的总裁选举制。要成为党内拥有绝对权力的领导者，必须拉拢党内各派系的支持。日本社会学家中根千枝认为，纵向集团自身的结构特点就决定了其产生“党中有党”的可能性，因为纵向集团的生存主要是靠人际关系来维持。^⑥所以日本政党的纵式结构关系就决定了当今日本政坛的派阀政治影响力必然

存在。

2、“家族国家观”与日本右翼政客的历史认识

日本近代的“家族国家观”，即运用日本传统的家族制度的原理，把统治与被统治者的关系比拟为家族父子关系，依靠被神化了的天皇权力，实现总家长（天皇）对臣民（全体国民）进行家长制统治的国家伦理观。^⑦现今日本右翼势力利用“家族国家观”来为日本开脱战争罪行。他们把日本视为亚洲唯一的领导者，他们利用日本传统文化中的“家族制度”中严格区分的家族人际关系，把日本视为是亚洲的“本家”，其它亚洲国家视为日本的“分家”。“分家要以本家为中心，本家与分家相仿相辅，形成大东亚共荣圈”。^⑧现今日本右翼势力所掌控的日本政界不遗余力地篡改修改教科书，特别是日本政界的“台湾帮”可以说是为日本侵略历史“翻案”的急先锋。1996年自民党本部成立了“思考日本前途和历史教育国会年轻议员会”，其组成成员大部分是“台湾帮”的成员，代表是中川昭一，安倍晋三任事务局长。在安倍晋三等人的资助下，1997年出版了《对历史教科书的疑问》一书，他们还开了数十场研讨会，为的就是证明“强征随军慰安妇”的记述是“错误”的。^⑨而在台湾，日本右翼所培植的一批媚日政客也在岛内积极配合日本右翼美化侵华历史的活动，受过日式殖民教育的李登辉在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期间，就大肆帮助日本美化其对台湾的殖民统治。

二、“家族制度”与日本政界的亲台势力

日本的亲台势力俗称日本的“台湾帮”。日本政界的“台湾帮”深受日本“家族制度”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家族制度”已经演变成为一种具有很强延续性的意识形态，“家族精神”的延续对维系日本右翼势力的生存起着决定性作用。日本政界“台湾帮”的据点和老巢是自民党1973年成立的“日华关系议

员恳谈会”，1997年发展为跨党派的议员团体——“日华议员恳谈会”（简称“日华恳”）。^⑩

安倍家族一直与“日华恳”有脱不开的关系，可以说安倍家族的“亲台”香火一直都没有断层过。安倍的家族背景十分复杂，出身于政治世家的他，外祖父是日本首相岸信介，外叔祖父是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作为“台湾帮”鼻祖的岸信介一直都把蒋介石奉为恩人，安倍也在公开场合多次表达过对其祖父岸信介的崇敬。安倍家族世代都主张要加强日美同盟关系，更是以或明或暗的方式极力把台湾纳入“日美安保”范围。可以说，安倍家族一门三首相鲜明地突出了日本政坛的世袭政治。

（一）岸信介时期的日台关系

岸信介时期是战后日台关系密切提升的阶段。从本质上说，岸信介时期的对台政策具有浓厚的冷战意识形态特点，在当时东西方冷战对峙格局的制约下，岸信介在对台政策上采取敌视大陆的政策，主张加强美日同盟关系，力图修改《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

1960年日美双方在华盛顿白宫签订了《日美共同合作与安全保障条约》（简称“新日美安保条约”），其中突出了“远东条款”。岸信介对条约内的“远东范围”作了说明，他说，远东“这一区域大体包括菲律宾以北以及日本周边地区，也包括韩国和‘中华民国’统治下的地区。”之后，“远东条款”在遭到亚洲各国反对后，岸信介又改为“日本周边、菲律宾以北，不包括中国本地和台湾附近诸岛”。^⑪“新日美安保条约”的主旨就是要突出台湾在西太平洋海岸重要的战略位置（台湾的地理位置掌控着日本的“海上生命线”）和“保卫”台湾的立场。岸信介时期修改的“新日美安保条约”与之后佐藤荣作时期的“尼克松——佐藤声明”实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在岸信介时期一直没有明确化的“远东条款”，在佐藤时期就被明确化了，特

别是声明中对于台湾地区的形势问题明确指出了：维持台湾地区的和平与安全对于日本的安全也是极为重要的因素（有关“台湾条款”）。^⑫

岸信介内阁时期日台政治经济的联系更加紧密。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日本国内的生产力已经基本恢复到战时水平，作为亚洲拥有先进生产力的国家，在这一时期日本给台湾提供了资金及技术上的帮助，对于国民党政权在台湾的稳固给予了物质上的保障。

（二）佐藤荣作时期的日台关系

岸信介内阁和佐藤内阁在日台关系上都是以“亲台反华”为主旨，始终是以本国利益为基准。岸信介内阁时期“反华”是为了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而佐藤内阁除了致力于发展本国的经济外，还把收回冲绳作为重要的外交目标，其“反华亲台”的动机与收回冲绳的外交目标有密切联系。

佐藤内阁初期在对台政策上经历了从“疏台”到“亲台”的过程。佐藤内阁在成立之初，为了获取支持，在对华政策上采取了积极的政策。但在他真正当选首相之后，并没有真正对华采取积极的政策，仍表示要积极发展和维持与台湾的关系。佐藤内阁之所以不能放弃台湾，是因为日本政府需要配合美国的对台政策，“对美一边倒”是这一时期日台关系的基本框架。

1967年9月7日，佐藤首相在访问东南亚各国时访问了台湾，这是战后继岸信介之后第二位日本现任首相访台。佐藤的此次访台与岸信介访台有所不同，佐藤并未对蒋介石的“反共”论调给予明确的支持，但进一步加强了日台经济关系，主要是继续向台湾提供日元借款。

战后，台湾对外借款几乎全部来自于美国，但由于美国疲于应对越南战争，逐渐减少对台经济上的援助。1965年6月中止了对台援助计划。当时，台湾的第四个“经济发展

四年计划”即将开始，只得求助于日本。1965年3月，日本前副首相石井光次郎作为内阁特使访台，4月26日在台北签署了日元借款协议，总额达到540亿日元（折合1.5亿美元）。1971年8月日本政府又决定继续向台湾提供2245万美元的借款，该借款主要是由日本进出口银行向台湾提供88.82亿日元的资金，用于台湾对日进口。通过日元借款，日台关系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⑬

佐藤内阁时期日本对台政策是以国家利益为轴心的，一直被“美国因素”所捆绑。虽然日美两国在1971年6月签订了《冲绳归还协定》，但在当时协定还需要得到两国国会批准，才能真正生效。为了谋求在冲绳议题上的利益，加上受到日本国内“台湾帮”的束缚，佐藤直到下台都未能冲破1952年“日台合约”以来形成的日台关系的基本框架。

（三）安倍晋三的“新国家保守主义”

安倍晋三是日本战后成长起来的中生代政治家的代表，他是在日本旧有的政治文化和政治基础上成长起来的，所以不可避免地带有旧体制保守主义的色彩。但是与上一代相比，安倍有着新的保守主义趋向。

1、以日本的国家利益为基准，具有强烈的政治主张

安倍晋三从政以来一直都坚定自己的政治信念，他在日本政坛的强烈鹰派色彩使他赢得了不少支持。在2003年《文艺春秋》刊登的其与石原慎太郎的对谈采访中，安倍认为作为政治家必须把日本的国家利益摆在第一位，必须明确说出自己的想法。^⑭

1997年11月，日本政界杂志采访了担任自民党外交调查会代理会长时的安倍晋三，当时他把“新日美安保条约”中的“远东条款”和盘托出，那就是1960年的“安保条约”当然是非常明确地把台湾列入“安保条约”的适用范围。他还强调说“把台湾海峡从适用范围中排除出去是非常危险的行为，因为中国

没有承诺说不使用武力”。^⑤安倍与台湾一些政界人士私交甚密，在2010年访问台湾时就特地跟台外事部门要求要访问民进党，并拜会了民进党主席蔡英文。2008年在前台湾“驻日代表”许世楷的卸任酒会上安倍晋三也毫不避讳地出席。

2、保守激进的历史史观

“皇国史观”成为日本右翼历史史观的精神支撑，日本右翼的历史史观的主轴就是美化日本的侵略战争。安倍重新上台伊始就公开抛出日本“侵略定义未定论”。他在担任自民党青年局长期间，对日本中学生教科书中有关“强征随军慰安妇”的描述持怀疑态度，他认为，没有一个证据能够证明军队是有组织地强征慰安妇。他觉得，教育应该是让学生对自己的国家抱有自豪感，中学教科书不应记载这样内容。^⑥可见，安倍是典型的日本中生代保守主义政治家，具有浓厚的民族主义情绪，可以说是日本战后军国主义消除不彻底的表现。

在日本社会流传着要当选议员必须要有“三ban”，地盘（地盘）、看板（招牌）、力バン（钱包）。可见在日本从政并不是件容易的事，需要有一定的家族背景作为支撑，这也导致了日本的世袭政治现象，特别是在派系众多的自民党内，安倍能在年纪轻轻的时候就当上首相，这在推崇“年功序列”的日本政坛实属罕见。安倍的职业生涯能顺风顺水，离不开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的提拔和福田康夫的帮助。日本人有传统的报恩意识，安倍晋三的爸爸安倍晋太郎曾经也提拔过小泉，照顾过福田康夫。在小泉的第一届内阁中，他任命福田康夫为内阁官房长官，任命年轻的安倍晋三为自民党干事长。互相栽培，互相照顾，成为自民党世袭的政治生态，在安倍的周围就织成一张张关系复杂的家族关系网。

综上所述，安倍家族“联美，亲台”的家族传统一直延续至今，很典型地贯彻了日本“家族制度”作为意识形态所提倡的“即使肉

体不在，但是家族信念永存”的指导意识。

三、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的结合

在上世纪冷战前期的数十年间，日本的右翼势力对亡命而来的“台独”分子给予了热情的接纳，日本成为了当时“台独”分子的避难所。上世纪80年代末，李登辉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逐渐露出他“皇民化台独”本质，凭借自己掌控岛内的政治权力，帮助“台独”势力内外合流于台湾岛内。2000年台湾政党轮替，陈水扁上台后凭借李登辉在日本打下的“台日关系”为基础，进一步在日本积极寻求支持，极力扩展“日台高层”的互动。

（一）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结合的原因

日本右翼分子很多都是日本政界的“台湾帮”成员，日本政界的“台湾情结”离不开历史因素，自身的主观意识，当然还有来自台湾方面的利诱。

1、传统思想意识“大亚洲主义”的影子

“皇国史观”宣传的“大亚洲主义”至今仍然残留在日本右翼的思想里。右翼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台湾对于日本有重要的地理意义，他们一直都把台湾当作是“日本的海上生命线”。日本右翼怕两岸若统一，就好像给日本的脖子上套上一条随时都可以勒紧的绳索。但实际上，同样每年有大批货物要经过台湾海峡的韩国为什么却没有如此担忧。日本右翼对台湾眷恋还是其骨子里的“大亚洲主义”在作祟。

2、日本统治了台湾50年，感情倾向于台湾与日本有分不开的联系

日本右翼无论在中日复交前还是复交后，对台湾的殖民统治还心存怀念。在日本政界有许多“台湾帮”的国会议员，特别是新中生代政治家许多都有亲台倾向，原自民党政调会代理会长船田元就说过，我从心底是亲台湾的。

3、日台双方的需求不谋而合

欲图谋政治大国地位的日本与欲争取“国际生存空间”的台湾不谋而合，日本的外务省和防卫厅热衷于宣传“中国威胁论”，这与“台独”势力主张相契合，双方都有遏制中国大陆发展的共同目标。日方的“中国威胁论”说得越生动，东亚局势说得越不稳，都更有利于推动日本的武器出口解禁和自卫队行使集体自卫权。

4. 台湾方面对日本右翼的金钱利诱

在李登辉执政期间，就设有“明德专案”基金在日政界、军界铺设人脉。因为日本有政治献金的法令，所以台湾方面与日本政界“台湾帮”人士的交往十分隐蔽，台湾方面总是以购买日本政界人士的餐会券来变相提供政治献金，而且不留下任何名目。日本自民党青年局内的年轻议员每次赴台后回到日本都会对台湾大加赞赏，然后变成新的一批“台湾帮”继任者。不过到目前为止，日本政界“台湾帮”的核心跨党派团体“日华恳”成员的具体名单还是不对外公开的。

(二) 日本右翼与“台独”势力间的联系

当今日本国会“台湾帮”的成员俨然已经成为日本政界中不可小觑的力量。李登辉和陈水扁执政（1988—2008年）22年间，日本与台湾的交往层级逐渐提升，特别是在陈水扁执政8年间作为“驻日代表”的罗福全（2000—2004年）和许世楷（2004—2008年）时期。深谙日本政界人情世故的两人，可以说担任了“台独”势力与日本右翼之间联系的中介人，为台日交往在这8年内突破了许多“不可能”，使“台日关系”有了更实质的提升。

1. 推动“台日高层”交往

一是结交旧一代“反共”议员，同时开拓新一代如安倍晋三、麻生太郎以日本国家利益为重的右翼政客的关系。如罗福全所谓的“老干新枝”战略。二是经营日本政治家的人脉关系。同日本“亲台”派系保持关系是

“台独”势力竭力争取的，如同对台湾一直很友善的“森派”，还有保持与日本国会跨党派亲台团体“日华恳”的紧密联系。三是推动“官邸外交”。日本政府对日台高层交往是有基本原则的，但当内阁阁员出现在某议员官邸时则代表私人身份。特别是2005年8月在日本众、参议院通过了台湾人入境90天免签证，这使得台日官员来往更加不受到拘束。四是推动“台日高层”交流制度化。“台独”势力通过制度的保障来与日本政界保持联系。五是通过打破“1972年”体制，暗中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按照“1972年体制”，台湾官员和日本官员是不能正式来往的，也不能在官厅所在地活动。许世楷任内为了突破“七二体制”，就经常秘密安排日本高官到台湾的“驻日代表处”与台湾的官员进行会谈；还积极游说日本国会推动日本版的“与台湾关系法”，希望以此来使台日关系获得制度的保障。

2. 推动台湾纳入“日美安保”范围

通过日本向美国强调台湾的重要性，提升“台美日”实质上的同盟关系是罗福全和许世楷作为“驻日代表”任内的最主要任务。2005年2月19日，日美两国在华盛顿召开“二加二会议”其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首次公开把台湾海峡划入日本“周边有事”范围。日本方面提出此提案的关键人物是“亲台”派的右翼自民党议员、时任日本外相的町村信孝和防卫厅长官大野功统。在“台独”势力和日本右翼政客的鼓动下，日本对中国大陆的军事威胁评估不断扩大，日本“周边有事”的范围除纳入台海外，近几年来已扩展到第一岛链区。

3. 把“台湾学”引入日本高校

罗福全任内已经和日本的早稻田大学的台湾研究所有学术交流的关系。早大的台湾研究所是“台独”人士致力于培养研究台湾的日本学生，研究所的建立得力于“亲台”右翼

政界人士如森喜朗的帮忙。2011年4月,原任东京大学教授的若林正丈改任教于早稻田大学,大大增强了早大的台湾研究阵容。

4、在日本为“台湾正名”

台湾人入境日本,要向日本政府申请“外国人登录证明书”,其国籍栏原本填的是“中国”,且日本法务省对台湾的分类是归于中国的。许世楷在任内通过“日华恳”的帮忙,众议院议员玉泽德一郎出面与日本法务省交涉,2008年法务省将有关国籍栏的法令改为“由地方自治体首长自行决定”。该法修订后,原本就赞成修改法令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立即宣布:住在东京的台湾人在“外国人登录证明书”的国籍可改为“台湾”。在2012年7月9日全面废止《外国人登录法》后,改依《住民基本台帐法》可以按照住民本人申告写上“台湾”。

可以说,陈水扁时期的“台日外交”是李登辉时期的延伸,“台独”势力与日本右翼势力的结合在罗福全和许世楷担任“驻日代表”这八年内有了一个实质性的提升,合作方式也更加隐秘,更加灵活。

四、结语

综上所述,扭曲的“家族制度”作为意识形态的影响力至今在日本政坛仍未消失,“亲台”右翼政客的后代逐渐把持了日本政坛。安倍晋三有着浓厚的“亲台”背景,保守思想已经残留生根在他的意识里。特别是当今“安麻体制”主导下的日本政坛,一些“台湾帮”还占据着日本国会的席位,“台独”势力还在日本积极活动。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

注 释:

①本泽二郎著、吴寄南译 《日本政界的“台湾帮”》,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版,第139页。

②③⑦⑧李卓 《家族制度与日本的近代化》,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7、191、192-193、208页

④赵军 《日本社会与日本右翼》,广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⑤⑥宫秀川 《从自民党看日本独特的派阀政治文化》,《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第104页。

⑨⑩李大光等 《一门三首相——安倍晋三家族与日本的世袭政治》,台海出版社,2013年版,第127-128、127页。

⑩1993年自民党分裂,由小泽一郎的反主流派另组新进党。“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也一分为二,新进党内小泽辰男为首议员随之组成了“日华议员联盟”。1997年“日华关系议员恳谈会”与“日华议员联盟”两个亲台组织又合为一体,扩大后成立了“日华议员恳谈会”(简称“日华恳”)的跨党派议员团体。1997年12月新进党分裂,一部分新进党亲台成员又流入了“日华恳”,2009年自民党在众议院换届选举中,全面败北,众议院中的部分“台湾帮”议员也纷纷落马。2012年12月16日在安倍晋三领导下的自民党在众议院选举中获胜。目前,“日华恳”还是日台关系互动最主要的沟通渠道。参见“日华议员恳谈会”维基百科。

⑪⑮陈奉林 《试析岸信介内阁时期的日台关系》,《东北亚论坛》,2004年第1期。

⑫永也信利 《日本外务省研究》,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294页。

⑬藏佩红 《佐藤内阁时期的日台关系》,《日本问题研究》,2000年第4期。

⑭《宰相の器》、《文芸春秋》、2003年八月号。

(责任编辑:刘凌斌)